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探索形成及其意义^{*}

郑有贵

[关键词] 乡村振兴道路；变革方向；实践突破；理论创新

[摘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成功探索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回答了如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之问，明示了新时代农业农村变革的方向，明示了亿万农民走共同富裕和迈向全面现代化的康庄大道，明示了底线性负面清单，是集“三农”实践突破和理论创新于一体的重大成果，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乡村振兴理论。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共同富裕之路、质量兴农之路、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乡村善治之路、中国特色减贫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相互促进，需要在系统思维下进行政策的体系性构建和实践的统筹推进。

[作者简介] 郑有贵，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北京 100009）。

实现乡村全面振兴这一新时代“三农”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对“三农”发展道路进行创造性拓展。这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在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程中，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命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如何实现乡村全面振兴这个时代之问。在如何探索乡村振兴道路上，习近平在2018年9月21日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先要按规律办事。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实现乡村振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创举，没有现成的、可照抄照搬的经验。我国乡村振兴道路怎么走，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探索。”^①在走什么样的乡村振兴道路上，习近平在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从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共同富裕之路、质量兴农之路、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乡村善治之路、中国特色减贫之路7个方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工农关系政策演变研究”（项目号：21AZD101）、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工程”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百年道路、伟大成就和基本经验研究”（项目号：2021MGCZD009）的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59页。

面,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进行了深刻论述和部署。^①党的二十大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②这次大会还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和本质要求。这些都进一步明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方向。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回答的时代之问和对新时代农业农村变革方向的明确

成功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是集“三农”实践突破和理论创新于一体的重大成果,体现了两重性:一是它的探索创新不是漫无边际,而是有很强针对性,是在回答如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之问过程中形成的;二是它的探索创新也是对农业农村变革方向作出的选择。

第一,明确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回答了如何破解二元痼疾进而实现城乡共同繁荣问题。在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引领农业现代化,也服务于农业现代化。但是,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明显存在,城乡二元结构成为难以破解的痼疾。马克思指出:“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这种划分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③马克思主义主张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提出工农联盟、工业服务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等主张。列宁在20世纪初曾构想通过“电气化将把城乡连接起来,在电气化这种现代最高技术的基础上组织工业生产,就能消除城乡间的悬殊现象,提高农村的文化水平,甚至消除穷乡僻壤那种落后、愚昧、粗野、贫困、疾病丛生的状态。”^④

能否处理好城乡关系,关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城乡二元结构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突出问题。形成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业与农业劳动生产率高低差异,由此也导致农业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马克思指出:“一般说来,应该承认,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下,农业生产率高于工业,因为自然在农业中是作为机器和有机体参与人的劳动的,而在工业中,自然力几乎还完全由人力代替(例如手工业等等)。在资本主义生产蓬勃发展的时期,同农业比较,工业生产率发展很快,虽然工业的发展以农业中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比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为前提,就是说,以大批人从耕地上被赶走为前提。”^⑤发展经济学也构建了城乡二元结构理论,提出了破解之策,但发展中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即便有的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因为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城乡二元结构不打破,“三农”发展受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弱质性困扰的痼疾就难以解决,城乡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现象就得不到扭转,农村甚至还会走向凋敝,农民甚至不得已穷居于城市贫民窟。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

①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41—156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4—185页。

④ 《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0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9页。

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①的命题，这是党的代表大会文件第一次使用城乡融合发展概念。

习近平指出，必须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②党的二十大报告在两处强调城乡融合发展。^③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积极探索城乡融合发展之策。一是着力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通过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④2018年3月，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愿意留在乡村、建设家乡的人留得安心，让愿意上山下乡、回报乡村的人更有信心，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在乡村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汇聚的良性循环。^⑤二是将坚持城乡融合发展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之一。^⑥三是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⑦

党的十八大以来10多年间，中国加快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城乡制度并轨深入展开，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公共资源合理配置，城乡融合发展迈出重大步伐。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框架基本构建完成，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门槛降低，农民在城镇落户不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条件，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向城镇居民转变的进程提速，2021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64.7%^⑧，比2012年提高11.6个百分点，年均增加高达1.3个百分点。在鼓励和支持城镇人才入乡返乡就业创新的政策鼓励和乡村产业发展吸引下，越来越多的新农人把实现人生目标与服务国家战略结合起来，聚集到农村大地就业创新，给农业农村增添了更多的发展新路径和新机遇。加之发展普惠金融和促进资本、技术等要素流向农村，扭转了劳动力、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由农村单向转移到城镇的格局。随着城乡融合发展的深入展开，农业农村现代化快速推进，农村民生快速改善。

第二，明确走共同富裕之路，回答了如何破解分化和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问题。党的二十大强调，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⑨社会财富增长而贫富两极分化得不扼制是资本主义的痼疾。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取向和表征是共同富裕。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于，既发挥市场促进资源更有效配置的作用，又避免这一过程中的马太效应、资本无序扩张等导致两极分化，促进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扎实走好共同富裕的道路。

习近平指出，必须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走共同富裕之路。^⑩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改革发展中切实把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有机统一于共享发展。在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方面，基于以私有制为基础导致两极分化的历史，明确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和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方向，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础地位，推进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推广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促进土地流转中，既注重提高效率，又注重增进农民权益。习近平指出，要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权益，防止土地过度集中到少数人手里，防止土地用途发生根本性变化，造成农村贫富差距过大。^⑪要让农民

①②⑥⑩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2—23、142、160、144页。

③⑨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8、31、22页。

④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802页。

⑤ 习近平：《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269页。

⑦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人民日报》2021年2月22日。

⑧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2022年3月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人民日报》2022年3月14日。

⑪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49页。

成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积极参与者和真正受益者。^① 实行工商资本流转农村土地审查审核和风险防范制度。^② 在处理工农城乡关系层面,针对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由于“三农”发展受弱质性困扰而难以破解城乡差别较大的问题,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着力构建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进一步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农村共同富裕工作要抓紧,但不宜像脱贫攻坚那样提出统一的量化指标。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对易返贫致贫人口要加强监测、及早干预,对脱贫县要扶上马送一程,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和新的致贫。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产业化,盘活农村资产,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使更多农村居民勤劳致富。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③

在共享发展理念下,中国的共同富裕之路越走越坚实,农村居民增收幅度高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由2012年的2.88:1,下降至2021年的2.5:1。农村集体经济稳步发展,2020年全国村集体经济收益超过5万元以上的村占54.4%,比2016年提高29.4个百分点;2019年成员从集体经济中获得分红累计超过3800亿元,是2016年的3.6倍。^④ 2013—2020年,全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了11.6%,增速比全国农村高2.3个百分点。2021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051元,比上年实际增长10.8%,比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7%高1.1个百分点,比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1%高3.7个百分点。^⑤

第三,明确走质量兴农之路,回答了如何破解低效困境进而促进高质高效问题。党的二十大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⑥ 低效问题长期困扰农业发展。中国受人多地少资源禀赋影响,土地经营规模较小,加之主要实行拼资源、拼消耗的粗放经营,农业效率受到价格“天花板”和成本“地板”挤压的问题突出,实现农业低质低效向高质高效转变是新时代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需要破解的课题之一。

习近平指出,必须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兴农之路。走质量兴农之路,要突出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农产品和食品安全问题,这是底线要求。如果这个起码的底线要求都做不到,老百姓对“舌尖上的安全”都不放心,还谈什么质量兴农,还谈什么竞争力。^⑦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迈上新台阶后,促进农业由偏重追求数量增长向结构改善和质量提升转变。针对亟需破解产量增加与品质提升、成本攀升与价格低迷、库存高企与销售不畅、国内与国外价格倒挂的矛盾,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质量兴农战略。2019年,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到2022年初步实现农产品质量高、产业效益好、生产效率高、经营者素质高、国际竞争力强的目标。10年间,中国坚持质量兴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协调好各方面利益,勇于承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阵痛,在降低改革成本和防范改革风险上采取有效措施;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增产导向向

①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56页。

②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二〇二二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人民日报》2022年2月23日。

③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

④ 参见《超七成村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人民日报》2020年8月23日;《43.8万个村完成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经济日报》2020年8月22日。

⑤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22年3月1日。

⑥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8页。

⑦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46—147页。

提质导向转变；优化现代农业的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促进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促进农民能更充分分享发展成果的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发展农产品加工、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产业，支持农民直接经营或参与经营的乡村民宿、农家乐特色村（点）发展，培育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支持创建了三批共 316 个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促进了农业多种功能的拓展和乡村多元价值的挖掘。

第四，明确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回答了如何破解生态环境污染现象进而促进农村宜居宜业和美问题。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增长是较长时期内的痼疾，以物为本的现代化也不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原则和方略，也是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表征。中国传统文明比较注意人和自然的和谐和统一，所形成朴素的“三才”观，既把天、地、人作为宇宙间并列的三大要素，又将其联结为一个系统的整体。^①中国传统文明中天、地、人“有机统一的自然观”，是中国古代人民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达到的水平，是中国不同于西方工业文明进程中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传统文明基础。基于这种传统文明基础，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把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作为重要因素，并不断丰富和发展。2017年7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七次会议时指出，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也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2017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党的二十大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明确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之一，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明确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这次大会还指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②

习近平指出，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推行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让生态美起来、环境靓起来，再现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村美人美的美丽画卷。^③2018年3月，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坚持绿色发展，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扎实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完善农村生活设施，打造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支撑点。^④党的二十大强调，扎实推动乡村生态振兴。^⑤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针对推进乡村振兴中面临生态环境污染的瓶颈，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在实施“一控两减三基本”^⑥的实践基础上，坚持绿色兴农，创造性推进乡村绿色发展，形成以绿色生态为导向健全农业政策支持体系、建立绿色低碳循环的农业产业体系、构建科学适度有序的农业空间布局体系，建设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改变围湖围海造田、过度放牧、过度养殖、过度捕捞、过度种植等过度消耗资源的发展方式，实行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快修复越来越薄的东北黑土地、重金属污染土地和华北地下漏斗区问题，建立健全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增加农业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调整农业投入结构，解决农村过量使用化肥、农药问题，提高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农田残膜资源化利用率，完善废旧地膜回收处理制度，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总体水平提高。《中国农业绿色发展

① 参见李根蟠：《“天人合一”与“三才”理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②⑤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9、31页。

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48—149页。

④ 习近平：《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269页。

⑥ “十二五”期间，农业部门明确了“一控两减三基本”的基本目标。“一控”，即控制农业用水的总量，划定总量的红线和利用系数率的红线。“两减”，即把化肥、农药的施用总量减下来。“三基本”，即针对畜禽污染处理问题、地膜回收问题、秸秆焚烧的问题采取有关措施，通过资源化利用的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好这个问题。

报告2020》显示,2012—2019年全国农业绿色发展指数由73.46提升至77.14,提高5.01个百分点。其中,2019年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绿色发展指数平均为83.0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5.89个百分点。^①2019年,全国耕地质量平均等级为4.76,比2014年提高0.35个等级;全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0.559,比2012年提高0.043。2020年,全国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农药利用率分别为40.2%和40.6%,比2015年分别提高5个百分点和4个百分点;重点地区的“白色污染”得到有效防控。^②

第五,明确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回答了如何破解人气低落进而重铸乡魂问题。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使传统乡村文化日渐消失。文化衰退是乡村缺乏聚集力和精神动力的重要因素之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之一,是改善人民物质生活和丰富精神生活的需要,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

习近平明确指出,必须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优秀乡村文化能够提振农村精气神,增强农民凝聚力,孕育社会风尚。^③《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设“文化繁荣”专章,为促进“文化传承”和“文化繁荣”提供法律保障。党的二十大强调,扎实推动乡村文化振兴。^④中国把文化振兴作为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内容^⑤,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红色文化,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促进了先进文化发展;建立村规民约、推广积分制等治理方式引导文明乡村建设,移风易俗,促进农村天价彩礼、人情礼金问题及因婚致贫现象的解决;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乡村文化,人们在城镇化进程中也能记得住乡愁,具有深厚农耕特质、地域特色的乡土文化成为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中国农民丰收节的设立和成功举办,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的启动实施,农民自发组织开展充满农耕农趣农味的村歌、“村晚”、趣味运动会等文化体育活动,促进乡魂的重铸,使乡村更具魅力和凝聚力。

第六,明确走乡村善治之路,回答了如何破解涣散乏力进而实现和谐聚力问题。处于深刻变化和调整时期的中国农村社会,出现错综复杂的新情况新问题,归结起来缘于一个“散”字。^⑥人心散,一盘散沙,乡村振兴是难以实现的。社会和谐、凝聚力增强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前提和重要标志,这需要通过乡村全面发展和有效治理的相互促进才能实现。

习近平指出,必须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⑦进入新时代,中国在乡村治理体系上进行了创新。一是明确了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提衣提领子,牵牛牵鼻子”。2018年3月,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推动乡村组织振兴,打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培养千千万万名优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安定有序。^⑧党的二十大强调,扎实推进乡村组织振兴。^⑨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完善村级重要事项、

① 李丽颖:《2021年农业绿色发展论坛在京召开》,《农民日报》2021年7月27日。

② 《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权威发布》,《农村工作通讯》2021年第16期。

③⑦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50、152页。

④⑨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1、31页。

⑤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9页。

⑥ 习近平:《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求是》2022年第7期。

⑧ 习近平:《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269页。

重大问题经村党组织研究讨论机制,全面落实“四议两公开”制度^①;加强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和党员队伍建设,全面向贫困村、软弱涣散村、集体经济薄弱村党组织派第一书记,解决弱化、虚化、边缘化党组织问题,发挥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战斗堡垒作用。同时,严肃查处侵犯农民利益的“微腐败”,严惩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的黑恶势力及充当保护伞的党员干部,以廓清农村基层政治生态。二是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习近平强调,“要丰富基层民主的实现形式,发挥村民监督的作用,让农民‘说事、议事、主事’,做到村里的事村民商量着办。”^②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深化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开展村级议事协商创新实验。三是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打造“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综合便民服务平台,一些村庄还建立了深受农民欢迎的网上办、马上办、全程帮办、少跑快办的网上服务站点。四是深入推进平安乡村建设,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五是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着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注重加强普惠性、兜底性、基础性民生建设。走乡村善治之路,中国农村社会朝着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方向发展,是续写中国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七,明确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回答了如何破解贫困进而脱贫致富难题。有的现代化理论认为,贫困问题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有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通过经济增长创造充足就业机会和有效需求的“涓滴效应”,可以治理贫困问题。但是,这些理论都没有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相反,贫困的“低水平均衡现象”“代际传递”现象在全球普遍存在。中国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受自然环境恶劣、交通极为不便等生产生活不利因素,以及区域发展中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影响,仅靠全国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乃至采取常规扶助措施,都是不可能解决的。

习近平指出,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③中共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立足中国国情,把握减贫规律,以超常规之举,构建起行之有效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成功走出中国特色减贫之路:坚持中央对脱贫攻坚的集中统一领导,把脱贫攻坚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谋划,强化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构建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局面,组织开展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集中力量解决贫困群众不愁吃、不愁穿和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简称“两不愁三保障”)的基本民生需求;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广泛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及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向贫困宣战,形成举国同心、合力攻坚的共同行动;坚持精准扶贫方略,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根源,实现由“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帮扶转变,让发展成为消除贫困最有效的办法、创造幸福生活最稳定的途径;实行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既富口袋也富脑袋,激发广大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内生动力,引导贫困群众依靠勤劳双手和顽强意志摆脱贫困、改变命运;坚持弘扬和衷共济、团结互助美德,营造起全社会扶危济困的浓厚氛围,形成了人人愿为、人人可为、人人能为的社会帮扶格局;坚持求真务实、较真碰硬,建立起全方位监督体系,力戒形式主义扶贫,做到真扶贫、扶真贫、脱真贫,真正让脱贫成效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

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的伟大实践,锻造形成“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历史性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提前10年

^①“四议”指村党支部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两公开”指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

^{②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53、153页。

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目标，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为全球反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成功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意义

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共同富裕之路、质量兴农之路、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乡村善治之路、中国特色减贫之路，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成功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统一下回答如何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之问的实践突破和理论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演进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是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基于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中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着眼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促进共同富裕进程中成功走出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乡村振兴理论。

“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是在经历改革开放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实践演进基础上，基于“城镇和乡村是互促互进、共生共存的”^①发展规律的明确深刻的认识，突破了城乡二元并行发展模式，拓展了“三农”发展空间，形成了破解乡村人口数量庞大下“三农”难题的新路径，有利于促进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加快形成。

“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走共同富裕之路”，是基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乡村振兴的制度基础”^②的深刻认识，有利于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以人为本的中国式现代化演进，增强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动力和聚集力。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兴农之路”，是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③的政治经济学视角的深刻认识，以及随着时代发展重新审视乡村价值^④的判断下明确的，有利于加快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培育，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促进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和向高质高效的有奔头的产业发展。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是基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良好生态为乡村振兴提供支撑点^⑤，农村环境直接影响米袋子、菜篮子、水缸子、城镇后花园^⑥，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是一场深刻革命^⑦等对绿色发展在乡村全面振兴中独有的价值、聚集力和内在动力的深刻认识是明确的，是对在生态环境上采取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道路的摒弃，是对中华优秀历史文化的传承和丰富发展，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生态文明价值追求，把实现生态美、百姓富统一了起来。

“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是基于“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⑧明确而深刻的认识，是不同于资本主义以物为本的现代化之路，将促进农民精神生活的丰富和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既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精神动力，也将使乡村更聚魅力、聚集力而促进乡村五大文明全面协调发展。

^{①②④⑤⑥⑦⑧}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42、144、148、148、457、149、150页。

^③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73页。

“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是基于“乡村振兴离不开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①的深刻认识，将促进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提升乡村善治水平，使乡村振兴有和谐进步的社会治理保障。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是基于脱贫攻坚要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必须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②和“乡村振兴，摆脱贫困是前提”^③的深刻认识是明确的，形成了系统回答脱贫攻坚的政治和组织保证、价值和目标取向、力量和制度支撑、路径和动力持久、主体和内力激发、美德和力量凝聚、务实和求真作风等重大问题的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④。

第二，成功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是在探索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在20世纪50年代初，面对以土地农民所有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的弱质性和实现工业化对农业发展的需求，中国共产党确立并实践了组织起来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根据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起来的生产力状况，探索了以赋权放活为内核的改革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在世纪之交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开启了实施“多予、少取、放活”政策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2013年12月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努力走出一条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此给予进一步明确，指出要以解决好地怎么种为导向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以解决好地少水缺的资源环境约束为导向深入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以满足吃得好吃得安全为导向大力发展优质安全农产品，努力走出一条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从破解如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之问出发，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不仅明确要推进农业现代化，还明确要推进农村现代化，在这一现代化内涵拓展演进基础上，实现了由探索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演进。乡村振兴道路的探索，要破解的问题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三农”弱质性困扰其发展的问题，要实现的目标是历史性升级了的乡村全面振兴这一战略目标。无论是作为整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还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的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共同富裕之路、质量兴农之路、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乡村善治之路、中国特色减贫之路，都明确了从中国式现代化演进的全局和战略高度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政策取向及其实现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功走出及政策体系的构建，有利于促进“三农”发展受弱质性困扰难题的破解，增强内生发展能力，厚植发展优势，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进而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使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更加坚实。

第三，成功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明示了亿万农民共同富裕和迈向全面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⑤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重要组成部分的乡村振兴道路，有鲜明的前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体现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是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建立起的农村集体所有制为制度基础、以共

①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52、172页。

②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8页。

④ 参见郑有贵：《脱贫攻坚伟大实践孕育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红旗文稿》2021年第7期。

⑤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8页。

同富裕为奋斗目标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把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作为引领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并推进制度创新，包括实行农村集体土地“三权分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份合作制改造、总结推广基层创造的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简称“三变”）等。这些改革在创建农民权益和集体权益统一的实现形式作出了积极探索，把激励集体和成员两个方面的积极性统一起来^①，既切实赋予了农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又使农村集体资产得以盘活和实现保值增值，促进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机制的形成，促进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明确，也明确了鲜明的底线性负面清单。在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明确了“四不能”底线，即“农村改革不论怎么改，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这些底线必须坚守，决不能犯颠覆性错误。”^② 2018年9月21日，习近平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把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③

第四，成功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明示了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共同富裕之路、质量兴农之路、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乡村善治之路、中国特色减贫之路，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统一下的有机系统。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为其他6个之路提供“四化同步”层面的引导、促进和支撑。走共同富裕之路为其他6个之路明确了价值取向、政策取向、改革发展动力。走质量兴农之路、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乡村文化兴盛之路，旨在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和农村全面进步升级，为走城乡融合之路、共同富裕之路、乡村善治之路、中国特色减贫之路提供支撑。走乡村善治之路为走其他6个之路提供乡村治理保障。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使其他6个之路走得更为稳健。鉴此，需要在系统思维下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进行政策的体系性构建和实践的统筹推进。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是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基于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中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着眼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促进共同富裕进程中成功探索出来的。成功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回答了如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之问，明示了新时代农业农村变革的方向，明示了亿万农民走共同富裕和迈向全面现代化的康庄大道，明示了底线性负面清单，是集“三农”实践突破和理论创新于一体的重大成果，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乡村振兴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成功探索及政策体系的构建，有利于厚植发展优势，增强内生发展能力，促进“三农”发展受弱质性困扰难题的破解，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进而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使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更加坚实。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共同富裕之路、质量兴农之路、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乡村善治之路、中国特色减贫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相互促进，需要在系统思维下进行政策的体系性构建和实践的统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促进“三农”实现历史性变革和取得历史性成就，为增强道路自信提供了坚实的实践支撑，也从实践上验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越走越宽广。

[责任编辑 李文苓]

^① 参见郑有贵：《农业“两个飞跃”应创建集体权益与成员权益统一的实现形式》，《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8期。

^{②③}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63、194页。

The Exploration and Formation of the Road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mplications

Zheng Yougui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China)

[Key words] the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direction of reform; practical breakthrough;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bstract] The path of socialist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plored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provided 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of our times about how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made clear the direc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reform in the new era, and clarified that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farmers will march towards common prosperity and comprehensive modernization, with a negative list system through which basic needs are met. It is a major achievement integrating the practical breakthrough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issues of “agriculture, farmer and rural area”, which enrich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s the Marxist theor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ursuing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spurring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by raising quality standards and promoting green development, helping rural culture to flourish, improving the rural governance, and embarking on a path of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integral parts of the socialist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se factors are interrelated and mutually reinforcing, which require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policies and the coordinated promotion of practices under systematic thinking.